

印度尼西亚共产党 的誕生及其发展

迪·努·艾地著

D33

3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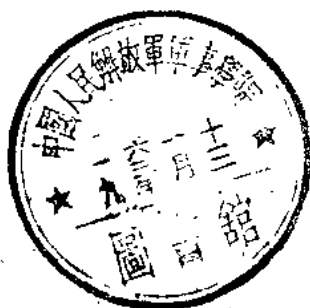
世界知識出版社



印度尼西亚共产党 的誕生及其发展

迪·努·艾地著

强明译



世界知識出版社

1961年·北京

D. N. Aidit
LAHIRNJA, PARTAI KOMUNIS INDONESIA
DAN PERKEMBANGANNJA
Jajasan "Pemburuan"
Djakarta, 1955
根据印度尼西亚“革新社”一九五五年版译出

印度尼西亚共产党 的诞生及其发展

(印度尼西亚) 迪·努·艾地著

强 明 译

世界知识出版社出版

(北京干面胡同 27 号)

北京市书刊出版业营业许可证出字第 101 号

北京新华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定价 0.12 元

1955 年 12 月第一版 1961 年 9 月北京第三次印刷

印张 1 1/2 · 字数 25,000

统一书号 3903 · 232

印度尼西亞共產黨成立於一九二〇年五月二十三日。因此，一九五五年五月二十三日是印度尼西亞共產黨成立三十五週年。

三十五年前印度尼西亞共產黨的誕生，是印度尼西亞工人階級政黨的誕生。這個黨的發展是印度尼西亞工人階級領導農民和其他人民羣衆進行反抗帝國主義及其走狗的英勇鬥爭及為了推翻反動政權並建立以大多數人民聯盟即工農聯盟為基礎的人民政權的鬥爭的歷史發展。唯有這樣的人民政權，才有可能在未來實現社會主義的印度尼西亞。

印度尼西亞共產黨三十五年的歷史，並不是平靜的與和平的歷史，而是經歷了許多動盪、許多危險、許多錯誤和許多犧牲的歷史。但也是英雄的、興奮的、有許多教訓和成功的歷史。

印度尼西亞共產黨三十五年來的發展可以劃分如下：

(一) 黨的成立和反抗第一次白色恐怖的鬥爭 (一九二〇年——一九二六年)。

(二) 二十年地下鬥爭和反法西斯戰綫 (一九二六年——一九四五年)。

(三) 八月革命和反抗第二次白色恐怖的鬥爭 (一九四五年——一九五一年)。

(四) 民族統一戰綫的擴大和黨的建設 (一九五一年——……)。

(一) 党的成立和反抗第一次白色恐怖的鬥爭

(一九二〇年——一九二六年)

印度尼西亞共產黨是印度尼西亞工人運動和放之四海而皆準的馬克思列寧主義相結合的產物。印度尼西亞共產黨在一九二〇年五月二十三日成立並不是一個偶然的事件，而是客觀的事件。印度尼西亞共產黨是在帝國主義時代，是在印度尼西亞有了工人階級，成立了工會及社會民主聯盟以及在一九一七年俄國十月社會主義革命之後誕生的。印度尼西亞共產黨是適時誕生的時代產兒。

斯大林在其所著的“論列寧主義基礎”一書中的說明使我們明瞭印度尼西亞共產黨的誕生乃是時代的必然性：

“帝國主義就是對極廣闊殖民地和依賴國內十多萬萬居民施行最橫暴的剝削與最無人道的壓迫。榨取額外利潤，就是這種剝削與壓迫底目的。可是，帝國主義在剝削這些國家時，不得不在那裏敷設鐵路，設立工廠，建立工商業中心。無產者階級的出現，本地知識界的產生，民族意識的覺醒，解放運動的加強，就是這種‘政策’不可避免的結果。所有一切而無例外的殖民地和依賴國革命運動之加強，就是顯明證明這一點。

“這個情況對於無產階級是重要的，因為這個情況根本破壞資本主義底障地，把殖民地和依賴國由帝國主義底後備力量變為無產階級革命底後備力量”。

斯大林在上面所說的，是完全符合於二十世紀初期在印度尼西亞所發生的情況。由於二十世紀初期在印度尼西亞的投資的迅速增加，殖民資本不得不在印度尼西亞經濟生活中實行巨大的改變。不得不建立原料加工工業如糖和橡膠工業。不得不

建築碼頭、鐵路和修理廠。因此，雖然帝國主義努力保持封建關係，但也不能夠防止資本主義傾向滲入到印度尼西亞民族中去。因此，印度尼西亞社會中出現了新的階級，其中包括無產階級。這形成了印度尼西亞獨立鬥爭的新的基礎，印度尼西亞共產黨就是在这个新的基礎上成立的。沒有組織的和不斷遭到失敗的農民暴動，現在已為有組織的並領導農民及其他革命階級的無產階級鬥爭所代替。

關於在印度尼西亞共產黨誕生之前，先成立工會和“印度尼西亞社會民主聯盟”這點，可作如下的敘述：一九〇五年成立了一個鐵路工會，名為“國家鐵路工會”。一九〇八年成立了“鐵路電車工會”，這是一個戰鬥性的鐵路工會。但是，印度尼西亞工人階級的覺醒的提高，已經要求不僅僅局限於工會鬥爭的組織。一九一四年五月在三寶壟成立了“印度尼西亞社會民主聯盟”，這是一個集合了印度尼西亞和荷蘭的革命知識分子，為了在印度尼西亞工人和人民中間傳播馬克思主義的政治組織。“印度尼西亞社會民主聯盟”於一九二〇年五月二十三日改組為印度尼西亞共產黨。

關於一九一七年十月社會主義革命如何推動印度尼西亞共產黨的成立，我只想引用毛澤東同志的話如下：

“十月革命一聲砲响，給我們送來了馬克思列寧主義。十月革命幫助了全世界的也幫助了中國的先進分子用無產階級的宇宙觀作為觀察國家命運的工具，重新考慮自己的問題。”

印度尼西亞共產黨的成立表明了印度尼西亞進步分子在迎接偉大的十月革命砲声並不落人後。換句話說，印度尼西亞進步分子和革命的印度尼西亞人民大眾及時地加強了新的反對世界帝國主義的革命戰綫。因此，爭取印度尼西亞獨立的鬥爭成為了全世界無產階級粉碎資本主義的鬥爭的不可分割的一

部分。

關於印度尼西亞共產黨人的任務，列寧在一九一九年十一月對東方各民族共產主義者的號召中，已經說清楚了。

列寧說：“在你們面前擺着一個任務，這個任務從前在全世界共產黨員面前是沒有提出過的，這個任務就是：依靠一般共產主義的理論和實踐，你們在應用於歐洲各國所沒有的獨特條件時，須要善於把這個理論和實踐應用於這樣的條件，即農民是主要羣眾，所要解決的鬥爭任務不是反對資本而是反對中世紀的殘餘。”

列寧的這一號召說明了東方的共產主義者，也包括印度尼西亞的共產主義者，不僅必須依靠“一般共產主義的理論和實踐”，而且也要使自己適應於“歐洲各國所沒有的獨特條件”，列寧在這裏所指的獨特條件就是農民。

印度尼西亞共產黨是新的階級即必須擔負起領導者的責任的工人階級的政黨。為什麼工人階級必須擔負領導者的責任呢？印度尼西亞工人階級雖然數量不多（約有六百萬人是工資勞動者，其中約有五十萬是現代工人或無產階級），但他與農民是有區別的，因為工人階級代表新的生產力；工人階級也不同于資產階級，因為工人階級擁有堅決的鬥爭意志，因為這一階級受到三種壓迫，即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和資本主義的壓迫。由於它的工作場所，工人階級是最有紀律的階級，由於沒有生產資料，工人階級是最堅決的和大公無私的階級。因此，工人階級雖然數量不多，但必須擔負領導的責任。

後來以反對荷蘭帝國主義的戰鬥者而著稱的印度尼西亞共產黨的成立，不僅受到印度尼西亞工人和農民而且也受到其他人民階層的熱烈歡迎。印度尼西亞共產黨同樣獲得軍隊和水兵羣眾的歡迎。印度尼西亞共產黨發展得非常迅速。

不久，共產黨人就在“工人運動聯盟”中具有很大的影響，“工人運動聯盟”於一九二〇年八月在三寶壟召開代表大會，有二十二個工會代表參加，代表七萬二千會員。共產黨人首先是通过戰鬥性的“鐵路電車工會”去發生影響。這是印度尼西亞共產黨在工人運動中的優良傳統的開始。

一九二〇年在爪哇和蘇門答臘發生了各種罷工，這些罷工一般是以工人的勝利而結束。這些勝利給了工人以鬥爭精神和鼓舞；教育工人認識了組織和紀律的重要性，並向工人和一般人民揭露了殖民勞工條例和殖民政府的腐敗。

工人運動所獲得的進展，使政府感到恐懼，尤其使它恐懼的是，共產黨的勢力日益強大。政府設法去影響“回教聯盟”，並加深共產黨人和“回教聯盟”之間的矛盾。在“工人運動聯盟”內部的改良主義派獲得荷蘭政府的支持，因而加深了革命派和改良主義派之間的矛盾。

一九二四年十二月，在日惹的哥達克特召開的印度尼西亞共產黨代表大會的記載稱：印度尼西亞共產黨有三十八個黨委，擁有一千一百四十個黨員，而印度尼西亞共產黨的外圍組織“人民同盟”擁有四十六個分支、三萬一千個盟員。

這證明印度尼西亞共產黨即使在荷蘭殖民政府的巨大阻礙之下仍獲得迅速的發展。“人民同盟”的迅速發展，顯示了農民對印度尼西亞共產黨的熱烈歡迎，因為“人民同盟”的成員主要是農民。

但是，黨並沒有能夠鞏固羣眾對黨的廣泛的同情以及較多的黨員人數。黨確曾在喚醒人民的反對荷蘭帝國主義的精神方面作了重要的工作，但是，黨沒有能力來鞏固它所已經獲得的成就。

當時印度尼西亞共產黨領袖的基本錯誤，就是他們成了左

傾口号的犧牲品，不努力說明情况，企圖一舉解決所有的問題，如消滅封建主義，擺脫荷蘭統治，粉碎所有的帝國主義者，打倒反動政府，消滅富農，消滅民族資產階級。自然的，這一切就導致真正的敵人和可能成為敵人的分子團結起來反對黨。這使黨本身陷於孤立並大大地削弱了黨。黨沒有充分地引導其黨員去關心同工人、農民及勞動知識分子的日常需要有關的細小和普通的實際工作，其實只有在這裏，只有在这种工作中，黨才能把廣大的勞動人民羣眾團結在黨的周圍。當然，這種工作並不是稱心如意的，不是沒有困難的。但是，要密切黨同勞動人民羣眾的聯繫，別的道路是沒有的。

正如一九五四年三月，印度尼西亞共產黨第五次全國代表大會的總報告中所說的，在第一個時期，

“黨對於聯合民族資產階級的必要性還是完全無知，黨提出的口號是‘立即實現社會主義’、‘印度尼西亞蘇維埃’和‘無產階級專政’。斯大林同志一九二五年五月十八日對東方大學學生的演說中正確地並中肯地批評了黨的這種‘左’傾偏向，他說：‘這是“左”的偏向，它包含着與廣大羣眾脫離並把共產黨變成宗派的危險。’”

黨犯上了共產主義運動中的“左”的毛病，這顯然已使黨變成一個宗派，使黨從廣大的人民羣眾中孤立起來，並使殘酷的殖民政府容易來粉碎黨。斯大林確切地說：“與這個偏向作堅決的鬥爭，是東方殖民地和附屬國培養真正革命幹部的必要條件。”斯大林同志以上的話的正確性，在印度尼西亞共產黨後來的發展過程中，我們深深地体会到。

至於建黨的工作，當時黨的領導還不可能真正地去注意它。黨內沒有進行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理論教育，機會主義分子潛入並控制了黨的領導機構，黨還不懂得批評和自我批評以及集體

領導的方法。这个事实使党在理論上、政治上和組織上都很軟弱。

在党脱离羣众和党的組織还非常軟弱的情況下，印度尼西亞的危机愈益加深，人民的生活日益降低，沒有組織起來的人民对政府工具進行的反抗也愈益加多。在這種情況之下，荷蘭殖民政府不断地進行挑畔，即解僱罷工者、逮捕農民、封閉印度尼西亞共產党或“人民同盟”舉办的學校，禁止工人的報紙出版、逮捕工人領袖等等。特別是為了对付農民，荷蘭組織了各種恐怖集團，如勃良安的“綠色同盟”。這一切導致了一九二六年十一月十二日在爪哇和一九二七年年初在蘇門答臘的人民起義的爆發。起義爆發後，印度尼西亞共產党即挺身而出，以便盡力領導起義。印度尼西亞共產党迅速出來領導這次人民起義的態度，乃是正確的。

起義進行期間以及起義之後，党的各種弱點則顯得特別突出。例如党的領導對於起義沒有一致的意見，对保衛党的領袖和幹部的工作毫無準備，各地方之間的行動沒有相互配合，城鄉之間的鬥爭沒有相互联系等等。除此之外，還有陳馬六甲這一類人（當時是印度尼西亞共產党領袖之一），他在起義開始之前沒有採取明確的措施，而在起義爆發之後却責難起義不對。尤有甚者，正當印度尼西亞共產党面對着殖民政府及其走狗的白色恐怖的時候，他和他的小集團竟公開地實行了托洛茨基的作法，建立新的政党——“印度尼西亞共和党”。印度尼西亞共產党內部的分裂使印度尼西亞共產党原來已經困難的工作更加困難起來，而且便利於荷蘭在印度尼西亞共產党內部以及在一般的民族獨立運動內部實現其分裂政策。

數以千計的印度尼西亞共產党黨員和工作人員被追逐和判刑，其中有的被絞死。有許多人被流放到伊里安利事的沼澤地

帶。只有幾個印度尼西亞共產黨領袖能够安全地逃往國外，其中有印度尼西亞共產黨中央委員會委員慕梭同志。

許多印度尼西亞共產黨黨員和工作人員，雖然他們參加黨的時間並不長，但其中大多數都具有強的党性。他們毫不後悔，含笑地走向絞架與接受監禁或流放的判決。印度尼西亞共產黨堅決反對荷蘭帝國主義的政策以及印度尼西亞共產黨黨員與工作人員面對當時的殖民政府所表現的英勇態度，提高了印度尼西亞共產黨在真正爭取獨立的戰士和印度尼西亞人民中間的政治威信。這使印度尼西亞被壓迫的人民增加了对印度尼西亞共產黨的信仰和愛戴。

一九二六年的起義，以印度尼西亞共產黨和革命的印度尼西亞人民的失敗而告結束。但是，有一件事情是不能够被忘却的，這就是這次起義向印度尼西亞人民指出了：荷蘭是可以被弄得手足無措的，殖民統治是可以被搖撼的，這種統治不是千古不變的統治。因此，一九二六年起義對於提高印度尼西亞人民的政治覺悟有着特別重大的意義。

由上述種種得出的結論是：印度尼西亞共產黨還不善於將馬克思列寧主義的一般原理和印度尼西亞革命實踐結合起來，因為印度尼西亞共產黨的領導還沒有掌握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理論，還沒有了解印度尼西亞的歷史和社會情況以及印度尼西亞革命的特點和印度尼西亞革命的規律。其結果便是：黨不懂得印度尼西亞人民客觀的基本要求，即消滅帝國主義和封建主義並實現民族獨立、民主和自由的要求。此外，黨的領導沒有認識到，為了實現上述要求，就必須建立以工人階級為領導、以工農聯盟為基礎包括工人階級、農民階級、城市小資產階級和民族資產階級在內的廣泛的統一戰綫。由於不了解這一切問題，當時黨的領導就產生了錯誤的想法，以為“農民在一切鬥爭中是不能

被信任的”，以为“中間階層和知識分子已經成为資本家的工具”，以为“印度尼西亞共產党必須反对一切資本主义”，以为印度尼西亞共產党的口号是“立即实行社会主义”、“建立印度尼西亞蘇維埃”、“实行無產階級專政”等等。

虽然，在这个時期中，党的組織是發展了，但沒有把党鞏固起來。黨員和党的幹部在理論和政治方面沒有加強，他們沒有獲得必要的馬克思列寧主义的教育。沒有能够使党内積極分子成为党的骨幹。在面對着第一次挑釁和白色恐怖的危急情況下，在党的領導中掌握實权的分子未能領導全党來挽救党。

總而言之，在第一个時期中，印度尼西亞共產党在兩個基本問題上沒有經驗，即：（一）統一戰綫問題，和（二）建党問題。

（二）二十年地下鬥爭和反法西斯戰綫

（一九二六年——一九四五年）

一九二六年起義之後，印度尼西亞共產党便被荷蘭殖民政府宣佈为非法。鑒於印度尼西亞共產党不能夠再从事合法工作，又由於它被左的口号所吸引，因此，原在印度尼西亞共產党領導下的革命羣众便轉而欢迎左翼民族主义政党，即在一九二七年成立的“印度尼西亞國民党”。印度尼西亞共產党的幹部和黨員除了参加各种羣众团体外，还有許多参加了这个左翼政党。但是，由於印度尼西亞共產党还没有建立新的中央領導，當時印度尼西亞共產党幹部和黨員的活動沒有獲得良好的領導。

自从一九二六年起義失敗以後，印度尼西亞的民族独立運動開始進入低潮。顯然，荷蘭殖民政府不僅鎮壓印度尼西亞共產党以及在印度尼西亞共產党領導下的革命的羣众組織，而且

以实行各种挑衅、阻撓它的一切活動和流放它的領袖等措施來鎮壓“印度尼西亞國民黨”。

当印度尼西亞共產黨和左翼民族政黨被殖民政府打擊的時候，在“印度尼西亞民族黨”內擁有基本力量的右翼民族主義者便趁機加強他們和荷蘭政府的合作。他們集中力量從事他們所謂“積極的”工作，即指建立合作社、學校、商會等等。在一定程度上，右翼民族主義者在若干地區甚至在鄉村中擴展了他們的工作。荷蘭樂於稱他們為“健康的民族主義者”，因為他們的活動和荷蘭政府的利益沒有衝突，也正因此，荷蘭政府給予他們以必要的方便。

但是，獨立運動的低潮為時不長。世界危機及隨之而來的廣大人民的貧困、緊縮開支、增稅、集體解雇等等，阻礙了右翼民族主義者和荷蘭政府間的穩當的合作。來自工人階級、農民和知識分子的急進的呼聲越來越响亮。這個危機時期通稱為“不景氣時期”，或如印度尼西亞農民所稱的“困難時期”。

在一九三三年二月間，猶如晴天霹靂，在“七省號”軍艦上發生了水兵暴動，這個暴動受到許多國家的工人的熱烈歡呼。這一事件對於重新鼓舞印度尼西亞人民反抗荷蘭殖民統治的精神是重要的。後來在一九三三年的七月，爪哇鐵路工人威脅罷工，荷蘭政府在印度尼西亞改良主義分子的幫助下好容易才阻止了它的爆發。

在各個地區發生了人民的反抗鬥爭，大多數是個人的活動，這證明反抗的鬥志在增長着。但由於印度尼西亞共產黨還未能良好地重建其中央領導，使荷蘭對工人階級的鬥爭和人民的反抗的鎮壓顯得輕而易舉。

自從一九三二年以來，從事地下工作的印度尼西亞共產黨，以十八條綱領為其行動的基礎，即：印度尼西亞完全獨立，立即

釋放所有政治犯並取消利享集中營，保障罷工權利和示威遊行權利，同工同酬，反對各種降低工資的措施，由政府救濟失業者，土地歸農民並沒收帝國主義者、地主和高利貸者的土地，反對新的帝國主義戰爭，等等。這個綱領是在法西斯分子（國家社會主義者）在德國當權之前制訂的。

在一九三三年三月間，德國法西斯分子在希特勒領導下登台。斯大林同志在聯共（布）黨第十七次代表大會上指出法西斯主義在德國的勝利時說：

“……不僅要把法西斯主義在德國的勝利看作是工人階級力量軟弱的表現，看作是替法西斯主義當清道夫的社會民主黨叛變工人階級的結果。同時還須把它看作是資產階級力量軟弱的表現，它表明資產階級已不能用國會制的和資產階級民主制的舊方法來實行統治，所以不得不在對內政策上採取恐怖的管理方法；它表明資產階級已不能用和平對外政策來找到擺脫現狀的出路，所以不得不採用戰爭的政策。”

換言之，為了對付深重的經濟危機，為了對付尖銳化的資本主義總危機和更加革命化的勞動人民羣眾，執政的資產階級便向法西斯主義尋求保護。

帝國主義者利用法西斯主義把全部危機的負擔轉嫁到勞動人民肩上。他們奴役弱小民族、加緊殖民壓迫以及發動新戰爭來重新瓜分世界，力圖以此來解決市場問題。他們摧殘工人和農民的革命運動，並向世界無產階級堡壘蘇聯發動軍事進攻，想以此來阻撓革命力量的成長。

季米特洛夫同志在一九三五年八月共產國際第七次代表大會上的演說中提到：“希特勒的法西斯主義，不僅只是資產階級的民族主義。這是野蠻殘忍的民族侵略主義。這是強盜政治的政體，它誣害和拷打工人階級以及革命的農民、小資產階級和知

識分子。這是中世紀的暴虐無道的野蛮制度。這是退性侵略其他民族及國家的制度。”

由於法西斯分子在德國的當政所引起的國際形勢的變化，對印度尼西亞政局的影響是重大的。蘇聯把鬥爭首先指向建立和平陣綫，以反對侵略國家。一九三五年八月在莫斯科召開的共產國際代表大會上也通過了一項綱領，目的是在工人運動中建立統一戰綫，建立人民陣綫和人民政府，以反對戰爭和法西斯主義。這就意味着在共產黨人和民主的資產階級分子之間實行更廣泛的合作的必要性。

為了傳達這個反法西斯的政治路綫，慕梭同志於一九三五年從國外返回印度尼西亞。慕梭同志不僅僅傳達這個新的政治路綫，他同時成功地重新把印度尼西亞共產黨的幹部聚集起來，並建立了印度尼西亞共產黨的新的中央委員會。但是，慕梭同志在印度尼西亞不能久留，他必須立即再度離開印度尼西亞，因為荷蘭政府已經發覺了他的行踪。這樣一來，慕梭同志沒有機會為黨的建設作很多工作，以致印度尼西亞共產黨的領導必須在沒有強有力的方針的條件下來建立列寧—斯大林型的黨。

在若干左翼民族主義者和若干共產黨人的倡議下，成立了合法的人民團體，稱為“印度尼西亞人民運動黨”。“印度尼西亞人民運動黨”的成立，給予民族獨立鬥爭和反法西斯運動以新的力量。在“印度尼西亞人民運動黨”及其他民主政黨的建議下，組成了“印度尼西亞政治聯盟”，也就是為在印度尼西亞建立議會，並和荷蘭政府商議共同反抗法西斯主義、首先是威脅亞洲人民的日本法西斯主義的各個黨派的統一戰綫。

一九三九年十二月二十三日至二十五日，“印度尼西亞政治聯盟”在雅加達召開印度尼西亞人民代表大會，非政黨的組織如工會、社會團體等也出席了這個大會，在該代表大會上議會問題

成為首要的議程。在印度尼西亞建立議會被代表大會視為重要問題，作為在對付法西斯主義危險中鼓舞人民力量的對策。後來，該代表大會的領導者決定將印度尼西亞人民代表大會改為被認為代表印度尼西亞全體人民的印度尼西亞人民會議。這是成立一個議會的準備。但是，荷蘭政府對這一事實置之不理。“印度尼西亞政治聯盟”和印度尼西亞人民會議向荷蘭提出合作以對付日本法西斯的侵犯的提議，到了一九四二年三月九日荷蘭投降日本為止，一直不被荷蘭所理睬。

沒有獲得廣大人民羣眾的支持的各政黨與團體的領袖之間的廣泛合作，已使爭取設立議會的要求遭到失敗，已使壓迫荷蘭政府積極與印度尼西亞人民一道進行反法西斯鬥爭的印度尼西亞人民運動遭到失敗。這是因為印度尼西亞共產黨還沒有形成為一個在羣眾中生根的能夠團結和動員廣大人民羣眾，首先是工人和農民的政黨。“印度尼西亞政治聯盟”和“印度尼西亞人民代表會議”作出各項決議但從未發動羣眾鬥爭如示威遊行或其他鬥爭來配合，作為對荷蘭殖民政府施加的有意義的壓力。

由於在印度尼西亞的反法西斯陣綫不夠強大，所以日本軍隊能夠沒有遭到抵抗而佔領印度尼西亞，不僅沒有遭到荷蘭軍隊的抵抗，而且也沒有遭到人民運動的抵抗。在面臨日本法西斯時，人民不論是物質上或精神上的準備都不夠。其結果是，在抵抗日本法西斯的初期印度尼西亞共產黨處於孤立的地位。在日本佔領初期，印度尼西亞共產黨中央委員會的委員和印度尼西亞共產黨的重要幹部有許多被日本逮捕，其中也有被處死刑的。

在日本佔領之後數個月，印度尼西亞人民根據本身的經驗才認識到日本法西斯的殘暴與獸行。在人民中間，反對日本的情緒越來越普遍，反法西斯的組織在各地成長起來，而且有許多

是在印度尼西亞共產黨黨員和幹部的領導下。當時，他們中間有許多人是在日本暗探追緝之下過生活的。日本對共產黨人的追捕是一刻也沒有停止過。由於組織不嚴密，印度尼西亞共產黨的重要幹部經常為日本所逮捕。但是，即使如此，日本的殘暴也不能壓下人民的反抗。到處發生暴動，如新雅巴那、南安由與三寶壟等地，而且在“保衛祖國軍”中間也發生暴動，其中最著名的就是諫義里州勿里達的“保衛祖國軍”的暴動。

關於日本佔領印度尼西亞之前和之後的反法西斯陣綫的問題，在印度尼西亞共產黨第五次全國代表大會的總報告中曾這樣說：

“反法西斯陣綫（日本佔領之前——迪·努·艾地）不僅成功地吸引了民族資產階級，而且也吸引了部分的買辦資產階級成為反日陣綫的後備力量。但是，自從日本軍隊佔領印度尼西亞之後，大部分民族資產階級以及可以說整個買辦資產階級採取了與日本合作的政策。民族資產階級當看到人民反日力量不怎麼強大之後，並幻想日本將給印度尼西亞以‘獨立’，他們便實行與日本合作的政策。”

但是由於反日情緒高漲，特別是在農民與軍隊的暴動事件發生之後，日本的走狗對其主子效忠的程度就越來越減退。最後，有不少高踞要職的人士與地下的反日運動發生聯繫。印度尼西亞的大學生和學生在反抗日本的鬥爭中也起着重要的作用。

這一切的結論是，雖然人民的反日和反荷情緒高漲，雖然由於黨執行堅定的反法西斯政策而享有很高的政治威信，雖然國內外的形勢對於發動革命非常有利，但是黨所面對的一九四五年八月爆發的革命的任務是非常繁重的，因為黨沒有把它在第一階段和第二階段的關於統一戰綫的經驗總結起來，而且在建

党的問題上仍然是沒有經驗的。此外，党也沒有武裝鬥爭的經驗，而這一經驗對於一個处在革命中的党是非常需要的。

(三)八月革命和反抗第二次白色恐怖的鬥爭

(一九四五年——一九五一年)

印度尼西亞共產党在八月革命中所处的情况是这样的，即尚未總結有關統一戰綫的經驗，在建党問題上仍然沒有經驗而且也沒有武裝鬥爭的經驗。

在羣众及其代言人即年輕的革命領袖，其中也有在日本佔領期間領導地下組織的印度尼西亞共產党黨員的壓力下，一九四五年八月十七日宣佈成立了印度尼西亞共和國。一九四五年八月十七日獨立宣言是體現了印度尼西亞人民在三個多世紀荷蘭統治下從未熄滅過的以及在日本佔領期間日益高漲的要求獨立的願望。

印度尼西亞的工人、農民、進步的青年和學生在學習歐洲許多國家在法西斯軍隊被擊潰之後從帝國主義統治下解放自己的範例以及受到中國人民偉大的解放鬥爭的鼓舞，認識到發動一個已為歷史所規定的革命的可能性。在宣佈獨立宣言時，除了已經遭到失敗的日本軍隊以外，在印度尼西亞（西伊里安除外）沒有其他的軍隊。這種良好的形勢已為印度尼西亞人民正確地利用了。

工人、農民、進步的青年和學生堅決保衛印度尼西亞共和國，他們最初抵抗日本軍隊，接着抵抗英國軍隊，在兩次殖民戰爭中抵抗荷蘭軍隊。

雖然印度尼西亞人民的這一鬥爭使愛國者流了許多鮮血，雖然荷蘭帝國主義曾進行了種種旨在粉碎共和國的軍事進攻，

但是共和國仍屹立不動。

荷蘭僅僅在使用英國和美國顧問以及它在印度尼西亞人中間的走狗的幫助下，通過長遠的途徑，“和平談判”的途徑，通過陰謀和挑撥，通過在大砲和炸彈的威脅下簽定有利於帝國主義的協定才能在削弱共和國的勾當中獲得成功。

自革命初期即已控制着政权的、以沙里尔为首的右翼社会党人，在执行在大砲和炸彈威脅下的“和平談判”的政策中扮演重要的角色。它之所以有可能，是因为印度尼西亞人民，受了長期的殖民地壓迫，不可能擁有一個能夠充分掌握馬克思、恩格斯、列寧和斯大林的革命學說的隊伍。

八月革命乃是民族統一戰綫的革命，主要的打擊是集中在和針對着外國帝國主義，民族資產階級也給革命以支持。

關於革命期間（一九四五年——一九四八年）的民族統一戰綫的問題，印度尼西亞共產黨第五次全國代表大會的總報告中曾這樣說：

“民族資產階級當看到人民革命力量強大之後，便重新參加到民族統一戰綫中來。具有強大力量的人民革命使民族資產階級在革命初期的幾年中抱有堅強的态度。”

但，總報告接着說：“黨在政治上、思想上、組織上的軟弱使黨沒有能力對當時非常好的客觀情況進行領導。”

關於黨與民族資產階級的關係，總報告說：

“在這一革命中，黨已拋棄了政治上、思想上、組織上的獨立性，並且黨沒有重視農民中間的工作，這就是革命失敗的基本原因。對革命的領導的軟弱使得革命在軍事、政治、經濟等方面不斷地遭受到失敗，這些失敗使民族資產階級動搖起來，而他們終於投到買辦分子和帝國主義方面去。一九四八年八月，印度尼西亞共產黨代表會議通過的‘印度尼西亞共和國的新道路’的決

議，是當時處於困境的印度尼西亞共和國的出路。但是，在執行這個決議之前，哈達—蘇基曼—納席爾政府發動了茉莉芬的挑釁事件。”

一個極其有利的情况是：在革命初期，可以從澳洲和歐洲寄來有關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理論書籍。但是，這些理論書籍都是外文版，主要是英文版與荷文版，因此能夠學習這些理論書籍的幹部非常有限。當時掌握黨的領導的分子，對於把理論書籍譯成印度尼西亞文的工作的注意是非常不夠的。雖然如此，但這些理論書籍已經有可能使有機會自學這些書籍的黨的幹部中間產生黨的骨幹。雖然人數還不可能多，但這却是印度尼西亞共產黨第一次有可能從自己的隊伍中產生有理論修養的骨幹，而這是印度尼西亞共產黨繼續發展的重要保證之一。

革命期間，黨擁有武裝力量，但黨沒有能力掌握它。黨的幹部非正規地學習軍事科學與革命戰爭的科學。數度在政府中擔任國防部長的阿米尔·沙利佛丁同志學習中國人民的革命戰爭，他為了這種思想，即游擊戰爭是取得革命勝利的一種正確的鬥爭形式的思想能取得勝利而進行了鬥爭。阿米尔·沙利佛丁同志必須進行堅決的鬥爭來反對那些軍事領導人的輕視游擊戰爭的思想。一方面阿米尔·沙利佛丁同志成功地使他的思想取得勝利，但是在另一方面，他的思想的實現遭到各種阻礙，因為受到那些輕視游擊戰爭的人的反對，因為缺乏有素養的軍事幹部以及因為沒有正確的統一戰綫政策和建黨政策而造成的困難。

黨當時在學習中國革命中所犯的基本錯誤之一，就是黨僅僅致力於了解中國革命與印度尼西亞革命之間的共同點，但沒有致力於了解其不同點，沒有看到印度尼西亞的特殊條件。

根據中國的經驗，對於像印度尼西亞這樣一個落後國家來

說，游擊戰爭、建立游擊解放區並在這些地區組織人民解放軍，乃是爭取完全的民族獨立的正確鬥爭形式之一。但是這種鬥爭形式在印度尼西亞沒有像中國那樣獲得巨大的可能性。這是由於印度尼西亞的特殊條件所致。

游擊戰爭的最有利條件，乃是廣闊的地區、廣闊的山區與森林區以及遠離城市與交通綫的地區。印度尼西亞的情況僅僅具備這些條件的一部分。

提出以上事實是否意味着游擊戰爭在印度尼西亞就行不通了呢？完全不是這樣。但是，為了使游擊戰爭的方法在印度尼西亞現有的條件下能取得更大的效果，我們應該設法使游擊戰爭的方法與敵人佔領的城市的工人的革命運動以及與經濟和政治總罷工鬥爭結合起來。在印度尼西亞這樣的條件下，所有的交通運輸部門即鐵路、汽車、航海、航空等部門的工人的罷工是具有特殊的意義的，因為無產階級在這些部門的總罷工是可以大大地削弱革命的敵人，從而給予游擊鬥爭以有力的援助。八月革命時期，共產黨人非常不重視在荷蘭佔領區組織工人和領導工人鬥爭的工作。

除此之外，八月革命時期，印度尼西亞共產黨沒有在荷蘭武裝力量中間進行有效的工作，在這些武裝力量中間有不少是農民與工人的子弟，他們是可以被爭取到革命方面來的。其實在敵人武裝力量中間進行有效的革命工作是可以大大地削弱敵人的力量的，而且這是意味着對游擊鬥爭的重要援助。

因此，八月革命時期的游擊戰爭是可以加以擴大並鞏固起來的，如果當時印度尼西亞共產黨基於下述三種鬥爭形式的結合來解決這個問題的話。這三種鬥爭形式是農村的游擊鬥爭（主要的成員是農民）、荷蘭佔領的城市中的工人革命鬥爭以及在荷蘭武裝力量中進行的有效的工作。

武裝鬥爭的失敗與武裝力量內部革命精神的鬆懈，經常是導致統一戰綫與建黨工作的後退。當武裝力量的若干部分，在反動分子操縱下，反對工人與農民運動以後，八月革命失敗的跡象也就暴露出來了。

在八月革命快要失敗的情況下，印度尼西亞共產黨在其一九四八年八月會議上，根據慕梭同志的建議，通過了一項名為“印度尼西亞共和國的新道路”的決議，作為印度尼西亞共和國擺脫當時所面對的艱難處境的出路。

“新道路”的決議提醒了黨的最重要的，但在八月革命期間被忽視或完全沒有執行的任務：

關於統一戰綫，該決議指出，在革命期間“共產黨人忽視了建立一個作為反帝民族革命的武器的民族戰綫。雖然後來他們開始認識到這一民族戰綫的重要性，但共產黨人尚未真正了解民族統一戰綫的實質以及建立民族統一戰綫的方法。三年來建立了若干種類的民族戰綫，但是經常全是停留在紙面上，這只是各團體或領袖之間的協商會議。如果這一民族戰綫各領袖間發生一些糾紛，就使這一民族戰綫瓦解。印度尼西亞共產黨確信，目前工人階級政黨不能單獨完成這個資產階級的民主革命，因此印度尼西亞共產黨必須和其他黨派合作。共產黨人必定要努力團結其他黨派與團體的成員。這種團結唯一的形式就是民族戰綫。”

關於共產黨人在建立民族戰綫中必須採取主動的問題，該決議說，這種主動性“絕對不是說：共產黨人強迫其他黨派或人們來參加，相反的，印度尼西亞共產黨必須耐心地使誠實的人們相信：獲得勝利的唯一道路，就是建立為所有進步的與反帝的人民所支持的民族戰綫。每一位共產黨人必須確信，沒有民族戰綫，勝利就不會到來。”

關於武裝鬥爭，“新道路”的決議說，必須特別重視這種鬥爭。武裝鬥爭必須予以特別的重視，因為荷蘭帝國主義繼續不斷地致力於加強其軍事力量。決議接着又說：“軍隊是最重要的國家政權工具，必須加以特別注意。軍隊的幹部與成員必須給予符合於軍隊任務的，即軍隊是保衛我國民族革命亦即保衛勞動人民利益的最重要的工具的特別教育。軍隊必須與人民團結並為人民所熱愛。軍隊必須由進步的幹部來領導。自然，首先必須在軍隊的幹部中間把反動的與反革命的分子清洗出去。”

該決議批評了由於忽視給予一般勞動人民（工人與國家公務員），特別是軍隊和國家警察人員的生活以保障，因此使得他們的生活無人照顧。

關於黨，該決議說，共產黨人的基本錯誤，乃是縮小了印度尼西亞共產黨作為工人階級在進行革命中必須掌握領導權的唯一的力量的作用。針對這個錯誤，“新道路”的決議說，印度尼西亞共產黨決定建議：“三個承認馬克思列寧主義原則的（印度尼西亞共產黨、社會黨與印度尼西亞勞工黨——迪·努·艾地）、目前聯合在人民民主陣線內的、並根據共同綱領採取聯合行動的政黨俾速合併成為一個工人階級的政黨，該政黨仍採用歷史性的名稱即印度尼西亞共產黨，……”

由於印度尼西亞共產黨支持以蘇丹·沙里爾為首的右翼社會黨人的反動政策，“新道路”的決議說，印度尼西亞共產黨因支持右翼社會黨人的政策，就犯了兩種錯誤：

第一個錯誤是，印度尼西亞共產黨沒有領會革命理論的教導，即：“現代反帝民族革命已經成為世界無產階級革命的一部分”，“印度尼西亞民族革命必須與世界其他的反帝力量，即全世界的，不論是殖民地、半殖民地國家或資本主義國家的革命鬥爭緊密地聯繫起來……。”

第二个錯誤是，印度尼西亞共產黨“沒有充分認識到，在蘇聯非常迅速地成功地解放整個東北（滿洲）之後，蘇聯與英美帝國主義之間的力量對比。當時，已經很明顯，蘇聯在亞洲大陸上的地位是非常強固的，它牽制着英國、美國和澳大利亞帝國主義的大量兵力，從而給印度尼西亞人民以良好機會來發動革命。當時，印度尼西亞共產黨人却過高估計了荷蘭及其他帝國主義的力量，而過低估計了印度尼西亞革命和其他反帝陣營的力量。”

上述決議說明，印度尼西亞共產黨已改變其政策，即明確地廢除“林牙椰蒂協定”和“倫維爾協定”，它們實際上已成為各領袖和人民大眾之間的各種混亂的根源。拒絕“林牙椰蒂協定”和“倫維爾協定”也意味着在印度尼西亞共產黨方面進行嚴厲的自我批評。

上述決議總結說，印度尼西亞共產黨在八月革命中的原則性錯誤，是由於黨在思想上的薄弱所致。因此，決定黨員必須學習馬克思列寧主義。每一個共產黨人有責任閱讀和學習革命理論，並有責任在工人與農民中間舉辦訓練班，以使用這種辦法使他們能夠經常將理論與實踐密切聯繫起來。不與羣眾結合的理論，不能夠形成力量；但是相反地，與羣眾密切結合的理論就能夠形成極為巨大的力量。

這樣一來，“新道路”的決議給印度尼西亞共產黨在統一戰綫、武裝鬥爭和黨的建設等方面的更良好的工作奠定了基礎。“新道路”的決議對黨內外的機會主義是無情的懲罰。它是拯救正在危險中的印度尼西亞革命的重要的步驟，而且是建立列寧斯大林型的黨的首要步驟。

印度尼西亞共產黨的新政策已經有可能使印度尼西亞革命新的高潮的到來。印度尼西亞共產黨召開來闡明印度尼西亞共

產黨新綱領的羣眾大會，有數萬以至數十萬人參加。羣眾熱烈歡迎印度尼西亞共產黨提出的繼續進行獨立戰爭來反對荷蘭帝國主義的号召。當時執政的反動政府的假面具開始在羣眾面前被揭穿。羣眾開始理解印度尼西亞共產黨所指出的新道路是贏得革命勝利的唯一道路。

由於害怕印度尼西亞革命的新的浪潮，荷蘭和美國帝國主義及充當其走狗的印度尼西亞人加緊它們的活動並確定步驟，以粉碎印度尼西亞共產黨和印度尼西亞共產黨領導下的獨立運動。

一九四八年八月底，在梭羅發生各種挑釁事件，後來在若干其他地方也發生這樣的事件。革命的軍官被卑怯地殺害。各個工會和印度尼西亞社會主義青年團的辦公地方為某方的部隊所強佔。

一九四八年九月中旬，在茉莉芬發生了贊同當時政府的反動和挑釁政策的軍隊集團與堅決忠實於革命的軍隊集團之間的衝突事件。這次事件是政府煽動起來的，它說，在茉莉芬發生共產黨人奪取政權和共產黨人建立蘇維埃國家的事件。政府根據這種虛構的理由号召所有的國家工具來追捕和殺害印度尼西亞共產黨黨員及印度尼西亞共產黨的同情者。這樣就爆發了第二次白色恐怖，這是一九二六年至一九二七年的荷蘭政府白色恐怖的翻版。但是，第二次比第一次更殘酷。在這種情況下，共產黨人除了拿起武器並以全力實行自衛，反對猖狂的白色恐怖之外，別的道路是沒有的。

“茉莉芬挑釁事件”是一九四八年十二月發生的新的荷蘭殖民戰爭的一種準備，而這一切又是強迫印度尼西亞向荷蘭帝國主義作進一步的投降的準備。果然，不久便與荷蘭實行停戰，隨後在荷蘭舉行了圓桌會議。

在一九四八年底至一九四九年初的反荷战争期间，印度尼西亚共产党的干部和党员，站在最前列英勇地参加保卫印度尼西亚共和国。这一事实使人民看清了“茉莉芬事件”期间反动派对印度尼西亚共产党所进行的污蔑的虚伪性。印度尼西亚共产党反对荷兰军队的坚决斗争提高了印度尼西亚共产党的政策在人民中间的威信，这就使政府不可能宣布印度尼西亚共产党非法。

一九四九年十一月二日印度尼西亚与荷兰王国签订了卖国的“圆桌会议协定”。在谈判期间，美国把马尔勒·柯契兰安置在荷兰，作为专门对双方发出指示的人物。

关于“茉莉芬挑衅事件”（一九四八年）至马斯友美党政府即苏基曼内阁下台（一九五一年）期间的统一战线情况，印度尼西亚共产党第五次代表大会的总报告中说道：

“民族资产阶级脱离了反帝民族统一战线而投到挑起‘茉莉芬事件’的哈达—苏基曼—纳席尔方面去的时期。民族资产阶级跟着投降了帝国主义，赞同了……卖国的‘圆桌会议协定’。民族资产阶级脱离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使党感到异常困难，因为党，由于它在农民方面的工作很弱，尚不能依靠农民。这种情况迫使党采取争取时间以便重新吸引民族资产阶级参加到反帝民族统一战线中来，以及改善和加强党在农民中间的工作的策略。党的这种策略的正确性已为一九五二年开始的国内政治的新的发展所证明。”

上述一切所得的结论是：

八月革命（一九四五年至一九四八年）已经遭到失败，因为印度尼西亚共产党在面临这次革命时还没有总结出它在统一战线问题上的经验，而且在武装斗争问题和党的建设问题上没有经验。

这次革命虽然失败，但是它已使印度尼西亚共产党取得了統一战綫的經驗。这次革命給予印度尼西亚共产党以重要的經驗，即關於民族資產階級的動搖性的經驗；在一定情況下，它能够參加革命及採取堅決的態度，站在革命方面；但是，在別種情況下，它會動搖和叛變。因此，無產階級和印度尼西亚共产党必須一貫地不斷地爭取民族資產階級到革命方面來，但也必須防備他們背叛革命的可能性。印度尼西亚民族資產階級的兩面性大大地影響黨的政治路綫和黨的建設。黨的進展或後退以及革命的進展或後退在很大程度上是有賴於黨與民族資產階級的關係。相反地，黨與民族資產階級的關係也在很大程度上有賴於黨的進展或後退以及革命的進展或後退。

在與民族資產階級聯合的過程中，黨不可以放棄其獨立性，並且不可忽視最可靠的、為數最多的同盟者，即農民。

這個革命也已經使印度尼西亚共产党取得關於黨的建設問題的經驗，使印度尼西亚共产党的幹部更了解印度尼西亚社會情況、印度尼西亚革命的特點和規律，使印度尼西亚共产党的幹部有可能來學習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理論並學習把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理論與印度尼西亚革命的實踐結合起來。

在革命中，武裝鬥爭是最重要的鬥爭形式，這也是一個經驗。黨的發展，除了在很大程度上有賴於統一戰綫之外，也在很大程度上有賴於武裝鬥爭。武裝鬥爭的進展與後退對統一戰綫和黨的進展與後退是很有影響的。

“新道路”這一決議已經總結了革命時期的經驗，雖然是不完整。“新道路”這一決議是為建設一個全國範圍的、與羣眾有密切聯繫的、在思想上、政治上和組織上鞏固的布爾什維克化的共产党的第一個重要步驟。

“茉莉芬事件”已經使印度尼西亚共产党的幹部和黨員們更

警惕和更有戰鬥性。

(四) 民族統一戰線的擴大和黨的建設

(一九五一年——……)

这个時期始自成功地起草了印度尼西亞共產黨黨章的一九五一年四月的中央委員會全体會議。这个黨章草案發到各下級組織之後，就引起了黨內的廣泛討論。不等代表大會的批准，全黨就已一致表示願意用这个黨章草案作為日常建黨活動的準則，而在執行这个黨章過程中所取得的實際經驗，將當作制訂修正案的資料。

印度尼西亞共產黨黨章的討論和實施大大地推動了黨的發展，提高了黨員的政治水平，活躍了黨內民主，活躍了黨內的批評與自我批評，加強了黨的紀律、思想和力量的統一。黨開始了解並開始實現其兩個基本任務，即：建立統一戰線的任務和建設黨的任務。這一切都是蘇基曼（馬斯友美黨）政府的統治下進行的。

由於意識到來自正在成長的革命人民運動和印度尼西亞共產黨的咄咄逼人的危險，由於看到“茉莉芬事件”事實上並沒有能“絞死”革命運動和印度尼西亞共產黨，外國帝國主義分子和國內反動派就瘋狂起來並再度製造陰謀，以消滅印度尼西亞共產黨。現在不是在梭羅或茉莉芬發動挑釁事件，而是對丹絨不碌的警察站進行“襲擊”，蘇基曼政府就把它宣佈為“共產黨的襲擊”。大約兩千名共產黨人和其他進步人士被逮捕並被關進監獄裏。但是由於人民的壓力，坐了幾個月監牢以後，全部都被釋放出來，沒有一個人能被送去法庭審判。蘇基曼（馬斯友美黨）及其“八月大逮捕”的失敗，表明印度尼西亞的革命運動已經重

新兴起並且有了力量。

还在“八月大逮捕”的形势下，即一九五二年初，印度尼西亚共产党就召开了全国代表会议，深入讨论对苏基曼政府的政策。代表会议决定必须通过建立广泛的反苏基曼政府战线及通过努力争取民族资产阶级，来推翻苏基曼政府。关于当时在西爪哇和中爪哇大规模地进行恐怖活动的“回教国运动”——“印度尼西亚回教军”集团，代表会议认为这些集团是帝国主义分子和国内反动派的工具，其目的是要把人民革命运动夹在城市的与农村的反动力量之间，从而使反动派能够粉碎革命运动并完全统治全国。代表会议决定要动员党的全部力量，并与国家工具和其他民主政党团体一道，共同粉碎“回教国运动”——“印度尼西亚回教军”恐怖集团。除此以外，代表会议通过了各项重要决定来鞏固党的思想和组织。为了使实现党当时的这一繁重而困难的任务成为可能，代表会议决定发展党员。

由于民主的人民运动继续不断的压力，由于民族资产阶级日益左倾以及国内统治集团间的矛盾的结果，苏基曼政府终于被迫下台，並於一九五二年四月一日成立了韋洛坡（印度尼西亚国民党）政府，它的政策的进步方面为印度尼西亚共产党所支持。在韋洛坡内阁中也有马斯友美党和印度尼西亚社会党的部长。由于反人民措施，一切民主力量，包括印度尼西亚国民党自己在内，推翻了韋洛坡内阁。在人民的更强大的压力之下，一九五三年七月三十日成立了没有马斯友美党和印度尼西亚社会党在内的阿里·沙斯特罗阿米佐约（印度尼西亚国民党）政府。印度尼西亚共产党支持阿里·沙斯特罗阿米佐约政府的政策的进步方面。

其政策有进步的方面并为工人阶级和人民大众所支持的政府的成立，证明了印度尼西亚革命运动高潮的出现。这表明民

族力量，包括民族資產階級在內，在面對國內外反動力量當中的日益團結。在這種情況下，在一定限度內，革命運動和印度尼西亞共產黨是能夠發展的。

在這個革命運動的高潮中，一九五三年十月召開了印度尼西亞共產黨中央委員會全體會議，作為印度尼西亞共產黨第五次全國代表大會的準備。在這次全體會議中提出了修改黨章草案的修正案，起草了印度尼西亞共產黨綱領草案、向代表大會作的總報告及對陳壽如主義的決議。陳壽如主義是要把黨的政治和組織路線恢復到“新道路”決議以前的情況的黨內機會主義思潮。這次中央委員會全體會議歸納了提到代表大會的建議，以解決印度尼西亞革命的所有重要和基本的問題。

一九五四年三月召開了歷史性的印度尼西亞共產黨第五次全國代表大會，其目的是解決印度尼西亞革命的所有重要和基本的問題，改善黨在建立統一戰線方面的工作，解決黨的建設的所有基本問題，並密切印度尼西亞共產黨與羣眾的聯繫。在這個代表大會上批准了一九五三年十月中央委員會全體會議所起草的所有文件。此外，還批准了印度尼西亞共產黨競選宣言並決定發展黨員和黨組織。

在分析印度尼西亞的社會情況之後，印度尼西亞共產黨綱領中確定了目前印度尼西亞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國家。關於這點，綱領提到：

“如果印度尼西亞的情況還是繼續不變，就是說，在帝國主義的統治沒有被推翻，封建主義的殘餘沒有被消滅以前，印度尼西亞人民就不可能使自己從貧窮、落後、不合理的情況中解放出來，就沒有力量對付帝國主義。當我國的政權仍然掌握在與外國資本密切勾結着的地主和買辦的手中的時候，在印度尼西亞的帝國主義統治和封建殘餘就不會被消滅，因為他們要在我國

保留帝國主義的壓迫和封建殘餘，因為他們最害怕印度尼西亞人民。”

“如果印度尼西亞要從一個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國家變成一個獨立的、民主的、繁榮的和先進的國家，最基本的問題就在於改變封建主和買辦的政府，建立一個人民的政府，即人民民主政府。”

關於人民政府，印度尼西亞共產黨綱領中說：

這個政府“將是一個在工人階級領導下，以工農聯盟為基礎的民族統一戰線的政府。鑒於我國經濟的落後，印度尼西亞共產黨認為這一政府不應是無產階級專政的政府，而應是一個人民專政的政府。這一政府不應實現社會主義改革而應實現民主改革。它將是一個能夠團結一切反封建和反帝力量、能夠將土地無代價地交給農民、能夠保證人民的民主權利的政府；它將是一個能夠保護民族工商業免受外國競爭、能夠提高工人的物質生活水平並消滅失業的政府。總之，它將是一個能夠通過民主與進步的道路來保證民族獨立和發展的政府”。

但是，擺脫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情況的出路和建立人民政府的道路何在呢？印度尼西亞共產黨綱領回答道：

“出路在於改變帝國主義者、地主階級、買辦資產階級和人民之間的力量對比。出路在於喚醒、動員和組織羣眾，首先是工人和農民羣眾。”

關於工人在改變這一力量對比中的作用，綱領說：

“工人階級必須領導全體人民的鬥爭。為此目的，工人階級本身必須提高其積極性，教育自己，使自己成為一支強大的和有覺悟的力量。工人階級不僅必須為改善本身的生活水平而進行鬥爭，而且也必須將自己的任務提高到更廣泛的和更高的水平。它必須幫助其他階級的鬥爭。工人階級必須幫助農民要求土地

的鬥爭，幫助知識分子爭取基本權利的鬥爭，幫助民族資產階級反對外國競爭的鬥爭，幫助全印度尼西亞人民爭取民族獨立和民主自由的鬥爭。只有當印度尼西亞工人階級成為一個獨立的、覺悟的、政治上成熟的、有組織的、並能夠領導全體人民的鬥爭的力量，只有當人民把工人階級看做是自己的領袖的時候，印度尼西亞人民才能獲得勝利。”

根據對印度尼西亞社會各階級的分析，印度尼西亞共產黨綱領弄清楚了革命中的真正朋友和敵人。同樣根據這一分析，印度尼西亞共產黨第五次全國代表大會決定使印度尼西亞共產黨担负起重要的任務：建立一切革命的民族力量即工人、農民、小資產階級和民族資產階級的統一戰綫的任務。這一統一戰綫必須建立在工農聯盟的基礎上，它必須是最廣泛而且是羣眾革命鬥爭的結果。這就是印度尼西亞人民建立一個人民政府，打敗革命敵人即帝國主義者、地主階級和買辦資產階級的条件。

為了建立真正的民族統一戰綫，印度尼西亞共產黨首要的任務是將農民吸引到民族統一戰綫裏面來。關於這點，在向第五次全國代表大會所作的總報告中說道：

“……為了吸引農民，印度尼西亞共產黨人的最近的任務就是消滅封建主義殘餘……農民工作的第一步就是幫助他們為日常的需要及取得部分的要求而進行的鬥爭。這樣就意味着組織和教育農民走上更高的鬥爭的階段。這就是建立作為强有力的民族統一戰綫的基礎的工農聯盟的依據。”

關於議會鬥爭和印度尼西亞共產黨對韋洛坡政府及後來的阿里·沙斯特羅阿米佐約政府的支持，印度尼西亞共產黨綱領說道：

“印度尼西亞共產黨認為它在議會中的工作不是黨的主要工作，議會鬥爭也並不是唯一的鬥爭形式。”

但是，這並非意味着印度尼西亞共產黨忽視普選和議會鬥爭，同時並非意味着印度尼西亞共產黨對迄今為止的歷屆政府或在人民民主政府組成前將要執政的政府採取同一的態度。

上述綱領說道：“印度尼西亞共產黨的政策是根據馬克思主義對於具體情況和力量對比的分析。印度尼西亞共產黨已經參加並將繼續最積極地參加議會鬥爭。印度尼西亞共產黨充分了解到它的政治責任，它以十分嚴肅的態度對待議會工作。印度尼西亞共產黨對過去的歷屆政府並不是採取一視同仁的態度。在一定情況下，印度尼西亞共產黨反對政府並號召羣眾起來推翻它，在其他情況下，印度尼西亞共產黨支持政府，在其他情況下，印度尼西亞共產黨參加政府。”

議會鬥爭和印度尼西亞共產黨對阿里·沙斯特羅阿米佐約政府的支持也必須是為了擴大和加強民族統一戰綫。

正如向第五次全國代表大會所作的總報告中所說的，建立統一戰綫的任務是印度尼西亞共產黨第一個緊迫任務。

印度尼西亞共產黨第二個緊迫任務是繼續建設全國範圍的、廣大羣眾性的、在思想上政治上組織上完全鞏固的印度尼西亞共產黨。

關於這點，代表大會要我們記取斯大林同志的話，如果我們要在革命中取得勝利，我們就必須有一個列寧型的革命黨，或者如毛澤東同志所說的，列寧—斯大林型的黨。

如果印度尼西亞共產黨沒有掌握馬克思列寧主義理論，那末，那樣的黨就不可能建立起來。只有為先進理論所指導的黨，才能起黨的先鋒作用。只有掌握了馬克思列寧主義理論的黨才能率領並引導工人階級和其他廣大的人民羣眾。

代表大會也認為，印度尼西亞共產黨只有不斷地與自己隊伍中的右的或“左”的機會主義者進行無情的鬥爭，才能完成它

的偉大的和嚴重的歷史任務。基於此，代表大會同意並支持一九五三年十月中央委員會會議關於陳壽如主義的決議。代表大會製訂了關於陳壽如主義的特別決議並作出結論說：“自一九四五年至一九四八年革命期間直到一九五一年年初，陳壽如主義實際上已在黨內佔統治地位。”代表大會確定：

“在思想方面，陳壽如主義是主觀主義，是黨內的教條主義與經驗主義的傾向，它使黨犯了右傾和‘左’傾的錯誤，並大大地破壞了黨和革命運動的發展。”

代表大會警告我們說，黨如果得勝，切勿驕傲，黨必須經常看到在工作中的缺點，黨必須敢於承認其錯誤並公開地誠實地改正其錯誤。只有黨不害怕批評和自我批評，只有黨不掩蓋它在工作中的錯誤和缺點，只有黨教育和鍛鍊它的幹部從黨的工作的錯誤中吸取經驗教訓並且善於及時地改正錯誤，那末，黨才是不可戰勝的。

由於印度尼西亞是小資產階級的國家；這就是說，在這個國家裏，小私有者的企業仍然很多，因此小資產階級意識，即主觀主義有它強固的社會基礎。因此代表大會規定，在黨內反對主觀主義對黨是非常重要的。兩種主觀主義，即教條主義和經驗主義對黨都同樣是危險的，它們能使黨實行右傾或“左傾”機會主義。只有當黨教育黨員利用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方法來分析政治形勢和估計階級力量，只有黨引導黨員去關心社會和經濟情況的調查研究時，黨才能反對主觀主義。

為了把廣大勞動羣眾團結在黨的周圍，黨必須引導其黨員去關心同工人、農民和勞動知識分子的日常需要有關的細小和普通的實際工作。這種工作並不是稱心如意和沒有困難的工作。但這就是密切黨和羣眾的聯繫，並使黨不致再成為左傾口號的犧牲品的唯一道路。

以上就是黨所決定的關於建黨的主要點。這樣一來，印度尼西亞共產黨的第二个緊迫任務也就清楚了。這意味着印度尼西亞共產黨已經從自己的經驗中學習建黨，並使自己成為列寧—斯大林型的黨。

關於統一戰綫問題和印度尼西亞共產黨自一九五一年以來的統一戰綫工作，黨代表大會已作出如下結論：

“……這是與民族資產階級的聯合日益密切，但工農聯盟尚未鞏固的時期。換言之，黨仍然尚未具有鞏固的根基。在這一階段中，黨必須大力地反對過高估計與民族資產階級的聯合而過低估計工人階級的領導與過低估計工農聯盟的右的偏向。這一危險是拋棄黨的獨立性的危險，是把自己與資產階級溶化在一起的危險。與此同時，黨當然要大力地防止‘左’的偏向，防止宗派主義，即不重視和資產階級建立民族統一戰綫，及不全力來維護統一戰綫的政策的态度。由於買辦資產階級集團投靠不同的帝國主義並由於目前黨的政策首先是針對荷蘭帝國主義而不是針對一切外國帝國主義，因此，造成了帝國主義者本身間的日益尖銳的矛盾，這種矛盾自然也在他們的買辦集團中間發生了。這一民族資產階級參加的統一戰綫的建立，對於黨的發展與建設，對於最近的黨的工作，即建立反封建主義的工農聯盟，提供了新的可能性。黨的建設以及工農聯盟的建立是無產階級對民族統一戰綫的領導的保證。”

印度尼西亞共產黨第五次全國代表大會研究印度尼西亞共產黨悠久的歷史，並以馬克思列寧主義為指針，在黨內清算了一九五一年以前的時期的錯誤。由於這次代表大會的成功，黨的黑暗的舊時期已經肯定地一去不復返了，而新的時期，始自一九五一年的時期正在欣欣向榮地發展着。

一九五四年十一月間，印度尼西亞共產黨中央委員會第二

次全体會議召開後，黨關於更加擴大統一戰綫的決定，發展了這個新時期。根據對印度尼西亞政治情況的分析，這次中央委員會會議指出，印度尼西亞共產黨已經成為朋友和敵人都不能忽視的重要的和偉大的民族力量。根據對印度尼西亞的歷史和政黨情況的分析，中央委員會決定，印度尼西亞共產黨必須積極使印度尼西亞共產黨同其他政黨，特別同各民族主義政黨和以回教為基礎的政黨之間的合作。上述決議是這樣論述這個問題的：

“對我們來說，共產黨及其羣眾和民族主義、回教政黨及其羣眾之間的合作，並不像民族主義和回教的領袖們經常所說的那樣，只是某種限於將來普選結束時為止的合作。不管將來是誰獲得勝利，我們在普選以後也要進行合作。我們的這種願望是符合於我們共和國‘殊途同歸’（有區別，但又一致）的口號的。”

中央委員會其他重要的決定是關於集體領導的方法。集體領導“是從思想上組織上鞏固黨、使黨更具有戰鬥性的以及密切黨與羣眾聯系的不可缺少的條件。有了這樣的黨，一切民族力量更廣泛的團結必將成為現實。”

以上所述的清楚地說明：三十五年來，建設黨並使黨布尔什維克化的過程，是和黨的政治路綫以及黨在解決統一戰綫問題上特別在處理黨和民族資產階級的關係上是否正確有非常密切的關係。相反的，黨愈益布尔什維克化，黨的政治路綫就愈益正確，而且黨在解決統一戰綫問題上特別在處理黨和民族資產階級的關係上也就愈益正確。

忠於它的英雄的和愛國的歷史，學習以印度尼西亞優秀兒女的犧牲換來的經驗，並以創造性的馬克思列寧主義為指針，印度尼西亞共產黨繼續執行其歷史任務。在目前情況下，印度尼西

亞共產黨不斷地和盡力地為擴大和加強民族統一戰綫而工作。
此外，印度尼西亞共產黨也將不斷地和盡力地繼續建黨並使黨
布爾什維克化，作為民族統一戰綫得以順利和成功的基本保證。
民族統一戰綫萬歲！

印度尼西亞共產黨萬歲！

創造性的和偉大的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學說萬歲！

